



吴凡：从这次疫情对社会的影响可以看到，公共卫生上的投入真的应该多一点。在传染病的预防上投入越多，那么我们遭受的损失就越少。

医疗卫生系统的比较，大家不能光比哪个城市投钱投得多，当然投资多一方面是表达了政府、公众、整个社会对医疗卫生的重视，但是我们也要看投入和产出的比，是不是你投得多、产出更好？

讲对卫生事业的投入产出比，可以看两个方面的指标。一个是世界卫生组织用来比较人群健康状况的三大指标：居民的期望寿命、婴幼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这三大指标反映的不仅仅是人群健康水平，而是整个社会发展以及医疗卫生系统对人群健康的保障水平。

上海最近公布了去年的居民健康三大指标。2019年，上海居民健康三大指标已连续十多年保持国内领先，并达到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领先水平：户籍人口期望寿命83.66岁（男性81.27岁，女性86.14岁）；上海地区婴儿死亡率3.06/千；上海地区孕产妇死亡率3.51/10万。

上海的这三个指标超过了大多数发达国家，我们是在第一阵营的，这就能说明我们上海在预防和治疗上的投入产出比很好。

第二个方面的指标是看人的健康期望寿命。“健康期望寿命”和“期望寿命”含义不一样。比如一个人活了83岁，但是在这83年当中，我们都希望完全健康的时间越长越好，最后卧床时间是最少的，费用又最低。如果能做到“健康期望寿命”长，那就意味着我们把有限的资源投到了最有效的地方，而且我们整

上海是第一个省级政府出台传染病防治管理办法的城市，是第一个省级政府成立公共卫生联席会议的城市。

个医疗卫生系统的质量也比较好，所以它产出是比较好的。

《新民周刊》：上海是人口密度大、国际交往频繁的大城市，上海靠什么保护2500多万居民的公共卫生安全？

吴凡：其实在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上，不管是放在全国，还是放到世界上，上海都是有底气说我们是拿得出手的，是经受过考验的。

2013年上海处置人感染禽流感H7N9疫情，世界卫生组织给出了最高的评价，说上海做到了“灵敏、专业、高效”，中国政府应对H7N9疫情被誉为是应对传染病的全球典范。

其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除了西方一些带偏见的评论以外，客观讲大家心里觉得中国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如果说应对传染病疫情是考试的话，从SARS到H7N9到今天的新冠肺炎疫情，上海的成绩我认为是优秀的。这样的成绩难道每次都是因为幸运？这绝对不是幸运。这来自我们长期以来对城市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

上海是第一个省级政府出台传染病防治管理办法的城市，是第一个省级政府成立公共卫生联席会议的城市，几十个政府部门大家坐下来，通过这种机制讨论公共卫生工作。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加强建设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网络，从市一级到区一级网络比较健全。

公共卫生的网底很重要，网底是谁？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尤其是近10年以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强化六位一体的功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功能绝对不单单是看门诊、开药，它承担了预防、保健、计划生育，还有基本医疗、康复以及健康教育，它有六个功能，它更多的功能是发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提供者的功能，这也是我们整个预防保健网络最坚实的网底。

尽管很多方面我们做得比别人好，但是我们要学的是别人最长的优点。4月8日上海发布了《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若干意见》，简称公共卫生20条，接下来围绕20条，还有多个配套政策会陆续出台。

20条里面大部分都不是硬件建设，更注重的是体系建设、机制建设、能力建设、保障建设。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已经有高水平的医院了，这些医院如何平战结合？平时这些医院都在为大家服务，但是医院要有预警的体系和机制，有能力去发现风吹草动，如果碰上一个新的疾病大流行了，没关系，医院马上可以切换模式，从平时的诊疗服务一下子切换成应急的救治状态。

这种切换靠的是什么？是政府部门之间的共同协同，靠的是上下不同层级之间的联动，而联动和协同，就是靠体制和机制的建设和完善。